

唐代「文宗」現象觀察

李寶玲*

中國文學發展，漢末有了極為重要的改變，文學創作結束了受儒家思想左右，脫離了以政教角度為主要考量，走入獨立於學術之外的階段，文學從功利性質轉為注重文學抒情的非功利性質。建安文學建立起重個性、重欲望、重感情，強烈生命意識的主抒情基調，正始受老、莊、玄學的影響，哲思的注入，文學又有了一番獨特的興味，加上時代談辯盛行，評鑑文學風氣隨之大開。六朝時人開始從文人創作作品，回顧並思考「文」的觀念，把「文」與「非文」分開¹，而針對文學作品及作者的鑑賞及批評，著作專書則始於摯虞的《文章流別論》與李充的《翰林論》，爾後，鍾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二書成為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也是六朝文學批評的巨擘代表。整體觀之，六朝對文學的討論，主要集中於作者才性及文章體別兩大主題²。唐代社會對文學的認知，建基在六朝的基礎上持續發展，在此基礎上，如何更有效的建立維護正統與秩序，是唐代主政者不遺餘力思考的重點³，此一議題，透過唐代「文宗」相關現象的觀

*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¹ 最明確的表述，是蕭繹的《金樓子·立言篇》云：「然而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詩如閭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惠巧，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猶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可知，古之學者分儒、文二類，今儒又分出學、文又分出筆。文必須具備「吟詠風謠，流連哀思」、「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猶會，情靈搖蕩」的條件，否則只能稱之為筆。

² 參考廖蔚卿《六朝文論》：「所以，六朝文論是循作者之才性及文章之體別兩大主題，加上時間及空間的貫通與範圍，論述、分析、評鑑文學的本體、方法、作用、流變與作家作品，完成它的內容。」頁 9。台北：聯經出版社，1978 年。

³ 葛兆光在〈最終的屈服——關於開元天寶時期的道教〉一文中，以宗教政策為例，充分說明此現象。該文收錄於榮新江主編《唐代的宗教信仰與社會》，頁 13—34。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

察與爬梳，將會有一些發現。

況且，越來越多文學研究者則主張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呈一種對話和互補的關係，把文學研究越來越狹窄的領域逐步擴大，使之置於一個廣闊的文化研究語境下來考察也許有助於擺脫文學研究的危機之境遇，而適當地分析一些（包括精英和大眾文學在內的）文學文本也不致於使文學的文化研究者走得過遠。⁴文學研究所涵括的範圍與必須考量的問題，絕不僅是關於文本自身的問題而已。所以，文學的學術研究，不應只停留在討論文學作品本身，例如關於結構、修辭、象徵、情節、人物、意義等議題之上，而是要將研究焦點轉向讀者藉由閱讀過程中，與文本之間互動、交流乃至「再創造」、「再詮釋」的現象。本文希望以唐代「文宗」當作是一個線頭，將一長串唐代政治／社會／文學現象的問題拉出，透過五個唐代「文宗」個案，作一觀察。

個案一——陳子昂

根據韓理洲的考證，梓州射洪人陳子昂當生於高宗顯慶三年（658），卒於武后聖歷二年（699），享年四十二。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二十四登進士第，之後，陳子昂「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伯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台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岷、峨之間矣。」⁵爾後數年，居東都，守麟台正字，武后奇其才，多次召見，且勅曰：「地籍英靈，文稱晔曄」，從此「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相鬻，飛馳遠邇。」⁶

《新唐書·陳子昂傳》：「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⁷王適之語，《舊唐書·陳子昂傳》亦載：「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⁸《唐才子傳》卷一，延續這個說法，寫道「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一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章，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海內文宗！』由是知名。凡所著論，世以為法，詩調尤工。」盧藏用《陳子昂別傳》云：「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游太學。壓抵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⁹傅璇琮主編《唐才

⁴ 見王寧〈文學經典的構成與重鑄〉，頁127，收錄於《當代外國文學》，2002年3月。

⁵ 見趙儋〈大唐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于公為故右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收錄於韓理洲《陳子昂研究》附錄，頁28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⁶ 見盧藏用〈陳子昂別傳〉，《全唐文》卷238，頁2412。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⁷ 見《新唐書》卷107，頁4078。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⁸ 見《舊唐書》卷107，頁5018。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⁹ 見盧藏用〈陳子昂別傳〉，《全唐文》卷238，頁2412。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子傳校箋》引羅庸《年譜》所做的辨正，認為《陳子昂別傳》所云：「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此處之詩，非專指《感遇》詩作，泛指其早期一般詩歌作品而已。¹⁰顯而易見的是，陳子昂對於初唐文壇的影響，主要透過他所創作的詩歌文學作品而產生，正如韓愈所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¹¹。

《舊唐書·文苑傳》「富嘉謨」下，敘述陳子昂「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¹²，此說主要受盧藏用所寫的〈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影響，做爲陳子昂的好友，盧藏用寫道：「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¹³然而，受盧藏用或《舊唐書》影響，而將陳子昂當作是一位掃盡六朝積習、扭轉初唐文風的關鍵者，顯然過譽，未必妥當。

理論與實踐，常是我們觀察文學影響的途徑，有關陳子昂文學思想的主張，主要的內容闡述，見於〈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該文指出文學創作要有風骨和興寄，而「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是文學發展追求的目標。¹⁴這篇文章所主張的內容，雖與盛唐文學發展方向相契，但針對個別作者作品評價時，所提出來的個人見解，存在著理論不夠客觀性、系統性的問題，加上此文是陳子昂去世之後，盧藏用爲他集成文集後才得以傳世，從現存與陳子昂同時代的文學家的文集中，並未見到有關此篇的任何相關討論，在當時能產生的波瀾，想必十分有限。何況，以陳子昂的政治地位來說，官不過拾遺，終生甚不得志，他對文壇的影響，恐怕應是「只能說是當時一個有代表性的過渡人物」¹⁵。

從詩歌自身的發展看，某個時代最傑出的詩人，最出色的作品，不一定處處代表著時代的詩美趣味與詩歌未來發展的方向，而某些並非優秀的二三流詩人的詩歌活動往往會在某些方面預示著詩歌未來的走向。¹⁶陳子昂的詩歌創作及理論，雖然預告著盛唐時代詩歌的精神與風骨，得到接續之後的詩人如李白、韓愈等人的肯定，但觀察陳子昂的一生，在他本人所處的時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¹⁷的孤獨身影，正是他的最佳寫照。今日我們在文學史所見到，所謂當代第一流的最重要作家，其實並未在當時真的發揮出像文學史所標榜的強烈光芒。

¹⁰ 參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一)卷1，頁110。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¹¹ 韓愈〈薦士〉，見《全唐詩》卷337，頁3780—3781。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¹² 見《舊唐書》卷190，頁5013。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¹³ 見《全唐文》卷238，頁2402。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¹⁴ 見《全唐詩》卷83，頁89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¹⁵ 參見趙慧平〈陳子昂文學地位與歷史貢獻的重新審視〉，頁8。收錄於《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5期，1999年。

¹⁶ 見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頁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¹⁷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見《全唐詩》卷83，頁902。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個案二——張說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中說：「唐有天下幾三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天寶已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熾。」¹⁸被玄宗推為「當朝師表，一代詞宗」¹⁹的張說，在盛唐文學的建設上，有著最舉足輕重的作用。

張說生於高宗乾封二年（667），卒於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得年六十四。載初元年（690）武后策貢士於洛陽，張說時年二十二，對策天下第一，授太子校書一職，《大唐新語》卷8〈文章第十八〉記載：

則天初革命，大搜遺逸，四方之士應制者向萬人。則天御雒陽城南門，親自臨試。張說對策為天下第一。則天以近古以來未有甲科，乃屈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監翫常，有司既糾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計之以寬。」拜太子校書。仍令寫策本於尚書省，頒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國得賢之美。²⁰

此後，張說歷仕武后、中宗、睿宗與玄宗四朝，「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²¹，《舊唐書·張說傳》則云：

始玄宗在東宮，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清內難，遂為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志，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後進，擅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睢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為倡首。²²

¹⁸ 見《全唐文》卷518，頁5261。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¹⁹ 見《全唐文》卷22，頁259。玄宗〈命張說兼中書令制〉：「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張說……，當朝師表，一代詞宗，……可兼中書令。」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²⁰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卷8，頁127。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亦見《資治通鑑》卷204。

²¹ 見張九齡〈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全唐文》卷292，頁2965。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一）卷1，頁136—137，「開元元年（七一三）七月，檢校中書令；八月戊戌，封燕國公。十一月，兼修國史。十二月庚寅（初一），改先天二年為開元元年，改易官名，中書省為紫微省，說為紫微令。同月壬寅（十三），姚崇兼紫微令；癸丑（二十四）說為姚崇所構，貶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開元三年（七一五），四月，除岳州刺史。五年（七一七）二月，遷荊州大督都府長史。六年（七一八），遷幽州都督、河北節度使。八年，（七二〇），改并州大督都府長史、持節天兵軍節度使。九年（七二一），九月，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一年（七二三），四月，正除中書令。……開元十四年（七二六）為宇文融、李林甫等所彈奏，四月，停中書令。十五年，（七二七），二月，致仕。十七年（七二九），三月，復為右丞相，依舊知集賢院事；八月，遷左丞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²² 見《舊唐書》卷97，頁3057。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從此段敘述看來，張說當時無疑是個成功的政治家與文學家，掌三十年文翰，是當代無人能及的大手筆，但他更重要的影響在於「喜延納後進，擅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幾乎開元前期知名的文學家都出自張說門下，如《舊唐書·孫逖傳》：「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說尤重其才，逖日游其門，轉左補闕」²³；《舊唐書·王翰傳》：「王翰，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登進士第，日以蒲酒爲事。……說鎮并州，禮翰益至，會說復知政事，以翰爲秘書正字，擢拜通事舍人，遷駕郭員外。」²⁴《舊唐書·賀知章傳》：「開元十年（722），兵部尚書說爲麗正殿修書使，奏請賀知章、秘書員外監徐堅、監察御史趙冬曦等人皆入書院，同修《六典》與文纂。」²⁵《舊唐書·韋述傳》：「中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游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道、迥、巡、迥亦六人，并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²⁶《舊唐書·徐浩傳》：「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集賢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²⁷《新唐書·張九齡傳》：「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歲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說適嶺南，一見厚遇之。……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此人之冠也。』……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²⁸蔣詒寧考察以張說爲中心的開元文士集團的情形，發現他們是呈「扇形伸展」，以張說爲端點，張說所提攜的文士爲中堅，而這些文士各自拔擢其他人才，於是逐漸擴大成扇面形狀。如張說獎掖張九齡，張九齡再舉王維；又如張說獎掖賀知章，賀知章再舉李白；張說獎掖孫逖，孫逖再舉杜鴻漸、顏真卿、李華、蕭穎士和趙驩。這樣的風氣形成後，在開元的政壇出現了一個超級龐大的文士集團，這些人以文人入仕的雙重身分及其集團的影響力，對開元的政治與文學作出了很大的貢獻。²⁹

張說知集賢院期間，主持編撰了許多部有名的典籍，如《唐六典》、《大唐開元禮》、《初學記》等，還奉詔搜括《文選》外文章，別撰一部《唐文府》。此外，張說對於文人優秀的作品，也表現心嚮往之的態度，根據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下評王灣詩：「灣詞翰早著，爲天下所稱最者，不過一二。游吳中，作〈江南意〉。詩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詩人已來，少有此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

²³ 見《舊唐書》卷 190，頁 5043。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 年。

²⁴ 見《舊唐書》卷 190，頁 5039。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 年。

²⁵ 見《舊唐書》卷 190，頁 5033。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 年。

²⁶ 見《舊唐書》卷 102，頁 3183-3184。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 年。

²⁷ 見《舊唐書》卷 137，頁 3759。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 年。

²⁸ 見《新唐書》卷 126，頁 4424。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 年。

²⁹ 參見蔣詒寧〈論張說延納後進與開元間的以文舉人〉，頁 131。收錄於《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3 卷，第 4 期，1996 年，10 月。

每示能文，令爲楷式。」³⁰據《資治通鑑》卷 212，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³¹，此事當發生於是時。

除了延納有文采的後進不遺餘力之外，張說反對輕視文士，還明白表示「文才」應是選拔官吏的重要指標，記載於《資治通鑑》卷 213，開元十四年（726），玄宗欲用崔隱甫爲御史大夫，當時官任中書令的張說，就以崔非由科舉，「薄其無文」爲由反對。³²相較之下，對於文士，張說常給予極高的評價，《大唐新語》卷 8〈文章第十八〉：

華陰楊炯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鄰、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炯與照鄰則可全，而盈川之言爲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則爲誤矣。」³³

另一則記載又說：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眾，唯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珎，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³⁴

《全唐詩話》卷 1，「沈佺期」條記載：

張燕公說嘗謂佺期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³⁵

³⁰ 見傅璇琮、李珍華撰《河岳英靈集研究》附錄《河岳英靈集》，頁 233。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³¹ 見《資治通鑑》卷 212，頁 6758。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³² 見《資治通鑑》卷 213，頁 6771。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

³³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卷 8，頁 124。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³⁴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卷 8，頁 130。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³⁵ 見《全唐詩話》卷 1，頁 72。收錄於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

由此可見，被張說評論的文士人數果真不少。

張說更想盡辦法提高學士在朝臣中的地位，《大唐新語》卷7〈識量第十四〉：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聽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³⁶

同書卷11〈褒錫第二十四〉：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為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³⁷

不難看出，在張說的心目中，學士較侍郎為美。侍郎僅是官吏之名，沒有可貴的實質內在，自古賢者並不企慕，學士則不然，傳承著先王之道，有著文學辭采，是官員行列中，最足堪為表率者。開元階段，朝廷由「吏能」轉為「文治」，張說功不可沒，無怪乎《新唐書·張說傳贊》云：「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³⁸張九齡〈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贈太師張公墓誌銘〉中說：

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丘明有恥，子雲不為，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為木鐸矣。³⁹

可見張說不僅有著革新文風的作用，更有激勵領導後人的功業。在他所提拔的後進張九齡的心中，自然地位無可比擬。但是，就一般唐人的眼裡，結果也相距不遠，《大唐新語》卷1〈匡贊第一〉云：

³⁶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卷7，頁103。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³⁷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卷11，頁165。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³⁸ 見《新唐書》卷125，頁4412。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³⁹ 見《全唐文》卷292，頁2965。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張說獨排太平之黨，請太子監國，平定禍亂，迄為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思精，老而益壯，尤工大手筆，善用所長，引文儒之士以佐王化。得僧得僧一行贊明陰陽律曆，以敬授人時，封太山，祠睢上，舉闕禮，謁五陵，開集賢，置學士，功業恢博，無以加矣。尚然諾于君巨、朋友之際，大義甚篤。及薨，玄宗為之罷元會，制曰：「弘濟艱難，參共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年；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說，星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共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釋義探繫表之微，英詞鼓天下之動。昔傳風諷，綢繆歲華。含春谷之聲，和而必應，蘊泉源之智，啟而斯沃。授命與國，則天衢以通；濟同以和，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為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吁嗟不慙，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洽若在耳；玉殿遺草，宛然留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用當宁撫几，臨樂撤懸，罷稱觴之儀，遵往歲之禮。可賜太師，賻物五百段。」禮有加等，儒者榮之。⁴⁰

鄒進先、張安祖在〈張說對唐詩發展的貢獻〉一文中指出：

人們研究唐詩繁榮的原因，追溯它的發展歷史時，往往都提道初唐陳子昂的筆路藍縷的開啟之功，認為他倡導詩歌革新，掃盡齊梁綺靡文風。的確，我們不能否定陳子昂所提倡的「風骨」、「興寄」理論以及體現這一理論的詩歌創作實踐對盛唐陽剛壯大的詩美形成有導夫先路的作用，為「盛唐之音」的到來作了有益的準備，陳子昂的革新之功不可抹殺。但是，他既非位極宰臣，又非文壇盟主，人微言輕，再加上他的理論主張偏頗及創作實踐的缺憾，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不足，多少削弱了他的革新力量和影響。可見，要想革新取得圓滿的結果，革新者不僅要提出新的革新理論，而且要有較高的政治上和文學上的地位，還要有真正能貫徹其理論的創作實踐。清人瞿源洙說：「蓋古未有以窮而在下者操文柄也。自漢唐及宋明，以文章名世或為執政或侍從貴近之臣，或司封疆千里之任。其即遭貶斥不得志，然未嘗不光顯於朝，譬如登高一呼，故能轉移好尚，以一人開風氣之先。」⁴¹

張說對唐代文壇的影響，與陳子昂絕對不可同日而語。

⁴⁰ 見唐·劉肅《大唐新語》卷1，頁10—11。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⁴¹ 見《求是學刊》第3期，頁59，1991年。

個案三——王維

王維生於武后天授三年（692），玄宗開元元年（713）年二十二擢進士第，卒於肅宗上元二年（761），享年七十。清·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中收苑咸〈答詩〉一首，其序曰：「王員外兄以予嘗學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枉採知音，行於雅作，輒走筆以酬焉。」詩歌內容並言及「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間氣賢」⁴²，在同時代的苑咸眼裡，王維在詩歌上的成就，已經被文壇接受及仿效，成爲一種新的詩歌範式，作品內容發揮人臣雅作精神，又將精通的禪理寫入詩作，這種創新引導一代詩風，所以稱王維是「當代詩匠」。

王維受到當時人們的肯定，也可以從另一件事得到證明。《舊唐書·王維傳》記載：

代宗時，縉為宰相。……常謂縉曰：「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嘗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縉曰：「臣兄開、天間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翌日上之，帝優詔褒賞。⁴³

《全唐文》卷 46 收有代宗皇帝〈答王縉進王維集表詔〉：

卿之伯氏，天下文宗。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篇，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誦於人口，久鬱文房。歌以國風，宜登樂府。旰朝之後，乙夜將觀。石室所藏，歿而不朽。柏梁之會，今也則亡。乃眷棣華，克成編錄。聲猷益茂，歎息良深。⁴⁴

代宗此段對王維詩作的論述，交代了王維的文學淵源仍是繼續《詩經》、《楚辭》的傳統，注入了個人風格特徵，如「泉飛藻思，雲散襟情」，受到當時廣大讀者群的喜愛，並且指出王維「位歷先朝，名高希代」地位的重要，給予「天下文宗」的高度讚揚。

代宗所云絕非溢美之詞，陳鐵民認爲在唐代人們對王維的詩歌的接受，遠遠超過李白、杜甫等其他重要詩人，主要的原因乃在於王維一生活動區域主要集中在長安、洛陽，並且優游於上層社會⁴⁵。《舊唐書·王維傳》云：

⁴² 見《王摩詰全集箋注》頁 142，台北：世界書局，1962 年。箋注引《春秋演孔圖》說明「正氣為帝，間氣為臣」。

⁴³ 見《舊唐書》卷 190，頁 5053。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 年。

⁴⁴ 見《全唐文》卷 46，頁 510。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⁴⁵ 參考陳鐵民〈唐代的詩壇中心與詩人的地位及影響〉，收錄於《唐代文學研究》第八輯，頁 89—103，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⁴⁶

以唐代社會對詩歌的重視，當時的王維勢必成為所有鎂光燈投射的焦點。杜甫於肅宗乾元元年（758）作〈奉贈王中允維〉五律，開頭便說「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⁴⁷；劉禹錫〈與歌者何戡〉也說「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⁴⁸；白居易〈對酒五首〉有「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⁴⁹。中唐後期的朱景玄也在他的《唐朝名畫錄》中說：「（王維）兄弟並以科名文學，冠絕當時，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⁵⁰左相指王縉，右丞即王維。

我們再從幾本唐人選唐詩的選本觀察王維的影響，唐人所選唐詩以《河岳英靈集》、《國秀集》、《篋中集》與《中興間氣集》最為重要，但元結編《篋中集》的主要目的在於表彰一些「名位不顯，年壽不將，獨無知音，不見稱頌」⁵¹的人，故不見王維的影響，其餘如殷璠《河岳英靈集》的序說：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寔由主上惡華好朴，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璠不揆，竊嘗好事，願刪略群才，讚聖朝之美，爰因退跡，得遂宿心。粵若王維、昌齡、儲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岳英靈為號。⁵²

在殷璠的標準裡，王維以首席詩人的地位出現。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主要以肅宗、代宗二朝的詩人為收錄對象，王維並不在此列。但被高仲武列於卷首的詩人錢起，高仲武對他的評語是：

員外詩，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越從登第，挺冠詞林。文宗右丞，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為雄。芟齊宋之浮游，削梁陳之靡嫚，迥然獨立，莫之與群。⁵³

高仲武將詩的發展往前推演，舉王維為源，下開錢起，對錢起的肯定等同於對王

⁴⁶ 見《舊唐書》卷190，頁5052。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⁴⁷ 見仇兆鰲《杜詩詳注》（一），頁454。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

⁴⁸ 見《全唐詩》卷365，頁4118。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⁴⁹ 見《全唐詩》卷449，頁506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⁵⁰ 見朱景玄《唐朝名畫錄》頁16，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1985年。

⁵¹ 見〈篋中集序〉，收錄於《元次山集》卷7。台北：中華書局，1965年。

⁵² 見傅璇琮、李珍華撰《河岳英靈集研究》附錄《河岳英靈集》，頁117。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⁵³ 見《唐人選唐詩（十種）》，頁2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維的肯定，可見高仲武對王維詩作的極度推崇。《國秀集》以選盛唐詩人為主，所錄八十五家、二百一十一首作品中，未見李白、杜甫、岑參之作，但王維有七首作品被選入。而中唐詩人姚合編選的《極玄集》雖以大曆詩人為主，但所選二十一家中，也以王維為卷首，在唐人選唐詩的選本中，王維不啻為唐代最被接受的詩人。

鄭喬彬認為唐人選的唐詩中，選錄的標準存在著一種「潛在的道德標準」⁵⁴，從王縉的〈進王維集表〉稱「臣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常持堅正，秉操孤直」⁵⁵所見，的確如此。

個案四——權德輿

相較於盛唐繁榮的文學，中唐初期，尤其元和以前，文壇受到的關注的確冷落許多。從大曆到元和，短暫的貞元過渡期，更是常常被人們所忽略。生於肅宗上元二年（761），卒於憲宗元和十三年（818），終年五十八的權德輿，一生經歷了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五代，自貞元起主持文壇二十多年，稱之為中唐的文壇的「盟主」並不為過。元稹所寫的〈上興元權尚書啓〉中說：「元和以來，貞元而下，閣下主文之盟，餘二十年矣」⁵⁶，韓愈在〈唐故相權公墓碑〉中說：「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⁵⁷，《舊唐書·權德輿傳》則載：

德於自貞元至元和三十年間，羽儀朝行，性直亮寬恕，動作語言，一無外飾，蘊藉風流，為時稱嚮……時人以為宗匠焉。⁵⁸

做為極重視是否進士入仕、是否出自郡望的唐代社會而言，權德輿以未曾應舉，又是庶族身分，僅以文名入朝，並且終身顯達順利，實在堪稱為唐代的「異數」。這樣特殊的背景，能在競爭激烈的朝廷佔有一席之地，與權德輿的家世背景及學術淵源有極大的關聯。⁵⁹

權德輿以文名稱顯，聰明早慧，如三歲能辨別四聲，四歲能屬詩賦，七歲父喪即以孝聞，十五歲為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10卷，弱冠，即以文名知天下。⁶⁰權德輿二十餘歲任淮南、江西二府僚屬，身為文壇前輩，當時享有極大盛名的詩僧皎然曾覆書給權德輿，文中說道：

⁵⁴ 參考鄭喬彬〈長安文化與王維詩〉，頁101—107。收錄於《文學評論》第四期，2001年。

⁵⁵ 見《全唐文》卷370，頁3756。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⁵⁶ 見《全唐文》卷653，頁6640。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⁵⁷ 見《全唐文》卷562，頁5687。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⁵⁸ 見《舊唐書》卷148，頁4005。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⁵⁹ 參考雷恩海〈走向貞元文壇宗主地位的階梯——權德輿的家事背景及學術淵源考察〉，收錄於《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4期，頁67—70，2002年7月。嚴國榮〈權德輿生平與交游考略〉，收錄於《唐都學刊》第13卷，第4期，頁26—31，1997年。

⁶⁰ 參考郭廣偉〈權德輿年譜簡編〉，收錄於《徐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三期，頁76—81、第四期，頁29—32，1994年。

觀其立言典麗，文明意精，實耳目所未接也。……初，貧道聞足下盛名，未睹製述，因問越僧靈澈、闕古豆盧次方，僉曰：「揚、馬、崔、蔡之流」。貧道以二子之言，心期足下日已久矣，但未識長卿、子雲之面，所恨耳。⁶¹

輩分甚高的皎然，對二十餘歲的權德輿禮遇有加，言盛名久聞，言悵恨未見，由此可知，當時權德輿的文名的確聲威遠播。

權德輿的文學創作，可謂詩文俱佳，就詩歌方面，他帶出台閣體的詩風，且各體兼備，清·翁方綱云：

元和間，權（德輿）、武（元衡）二相，詞並清超，可接錢、劉。⁶²

翁方綱認為權德輿的詩可以與錢起、劉長卿並駕齊驅，無疑大大肯定了權德輿在中唐詩歌創作的地位。至於他的文章寫作方面，可以從德宗賞識其文辭，使他掌詔誥達八年之久，「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德宗譽為「須得如卿者，所以久難其人」⁶³。《新唐書·權德輿傳》稱他「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觀」，《舊唐書·權德輿傳》則說他「於述作特盛」、盛讚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文人薨沒，以免銘記為請者什八九，時人以爲宗匠」。

在當時詩文皆受到極大肯定的權德輿，反觀在我們今日的文學史上，並未給他相對的評價高度，段承校在〈權德輿與韓愈關係探微〉一文中表示：

《舊唐書》本傳稱：「德輿居西掖八年，期間獨掌者數歲。」對於唐代文人來說，這可是榮耀至極的仕履，為支撐起權氏作為一代文宗的地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後世的文學研究者輕視此類制誥等應用性文學和應制中之作，極不情願承認此類文人的地位，並一次次改寫文學史的排行榜。行人寒士的苦吟哀鳴，總能在後世的解讀過程中找到共鳴者。於是宗主和附和者的次序被顛倒了，盟主退居二線，寒士的歌吟代替了廟堂文學、台閣體，成了文學史反複述寫的主流作家。可文學史的原生狀態並未像我們今天所讀解的那樣。佔據文壇盟主地位的乃是那些從容應對，代君擬言，揄揚士人，臧否人物的「文人」，而這樣的「文人」由於各種原因，是為當時士人所普遍認同和仰羨的。……權氏久處權衡，操士子命運之柄，其理論主張和為文傾向有模範士子的作用，韓、柳豈可同日而語？⁶⁴

⁶¹ 見皎然〈答權從事德輿書〉，收錄於《全唐文》卷917，頁9551。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⁶² 見翁方綱《石洲詩話》卷2，頁68。台北：藝文印書館。

⁶³ 俱見《舊唐書·權德輿傳》卷148，頁4003。台北：洪氏出版社，1974-1977年。

⁶⁴ 見段承校〈權德輿與韓愈關係探微〉，頁47-49，收錄於《西安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卷，第3期，2000年7月。

權德輿認為「育才造士為國之本」，希望通過改革科舉取士制度，使國家恢復正軌，葛曉音認為：

後來，不僅有賈至、楊綰、趙匡等通過奏疏、書論呼籲改革舉選，還有權德輿這樣的重臣實施過考問經義的取士方法。在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到韓愈、柳宗元之間，權德輿是個承前啟後的重要人物。他既有「尚氣、尚理、有簡、有通」的文說，又歷任禮部、吏部尚書和宰相，長期居於選人高位。所以能在執掌典選時期，改革不重經義，但習駢儷的考試方式。⁶⁵

由於權德輿職居清要，朝廷多次委以舉才大任，他所舉拔的後輩人才之一的楊嗣復，在〈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中說：

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升名者十七人；及為禮部侍郎，擢進士第者七十有餘。鸞鳳杞梓，舉集其門，登輔相之位者，前後凡十人。其他征鎮岳牧、文昌掖垣之選，不可悉數，繼居其任者，今猶森然。⁶⁶

經權德輿之手所取之士，如楊嗣復、牛僧孺、李宗閔等，經權德輿推薦者如韓愈、柳宗元等，這些都是當代一時之選，無怪乎韓愈盛讚權德輿「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丈人得其識，文道當大行」⁶⁷。作為貞元時期的文壇宗主，韓愈以「道德人」⁶⁸讚美他，楊嗣復則說：

唐有天下二百二十載，用文章顯於時，代有其人。然而自成童就傅以及考終命，解巾筮仕以及鈞衡師保，造次必於文，視聽必於文，采章皆正色而無駁雜，調韻正聲而無奇邪，滔滔然如江河東注不知其極；而又處命書綸綍之任，專考覈品藻之柄，參化成輔翊之勳，初、中、終全而有之，得之於相國文公矣。⁶⁹

觀其一生，凡加諸於權德輿之美名，真可謂當之無愧。

⁶⁵ 見葛曉音〈論唐代的古文革新與儒道演變的關係〉頁163，收錄於《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⁶⁶ 見《全唐文》卷611，頁6176。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⁶⁷ 見韓愈〈燕河南府秀才〉，收錄於《全唐詩》卷339，頁3806。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⁶⁸ 見〈唐故相權公墓碑〉，收錄於《全唐文》卷502，頁5687。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⁶⁹ 見楊嗣復〈丞相禮部尚書文公權德輿文集序〉，收錄於《全唐文》卷611，頁6176。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個案五——韓愈

權德輿和韓愈是中唐貞元、元和間相續的文壇盟主，對中唐的詩文繁榮，先後多所貢獻。韓愈生於代宗大曆三年（768），卒於憲宗元和十三年（818），享年六十。貞元八年（792）二月陸贄知貢舉，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共二十三人登第，其中包括陳羽、歐陽詹、李觀、王涯、韓愈、馮宿、庾承宣、崔群等，當時以「龍虎榜」稱之，號為得人⁷⁰，時韓愈年二十五。呂正惠認為因為此次的考試，韓愈、李觀與孟郊在長安奠定交往的情誼，也就是說，韓愈集團的形成，在貞元七、八年已略具雛型。⁷¹

貞元十二年（796）後，韓愈文名日盛，李翱、張籍赴汴州向韓愈學習古文，數年間，張徹、侯喜、皇甫湜、盧仝的加入，集團儼然成型，李肇《國史補》說：

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
愈後官高，不復為也。⁷²

元和元年（806）的韓愈，已隱然一代文宗，元和以後，韓愈的政治生涯不再如從前一般的乖舛，甚至連續任刑、兵、吏部侍郎、又身兼京兆尹與御史大夫，官職極高，這一切恐怕要歸功於韓愈的文名。可以看出，韓愈是憑著韓門弟子的逐漸增加，憑著韓門弟子的陸續考上進士，而奠定後來的官職基礎⁷³。

韓愈對人才的推薦與提攜，以貞元十八年（802）為例，韓愈一口氣向典貢舉的權德輿副手陸儔推薦侯喜、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劉述古、李紳、張後餘、張苾及韋群玉十人。其中尉遲汾、侯雲長、沈杞、李翊皆以其年登科，劉述古於貞元二十一年（805）登科，李紳則遲至元和元年（806），張後餘、張苾在元和二年（807）一登進仕第，獨韋群玉一人未能榜上有名⁷⁴，韓愈如此不遺餘力的推薦後輩，有意形成一個集團的態度相當明顯，在他的〈醉贈張秘書〉一詩中可以找到佐證：

……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君詩多
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
避雞群。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

75

⁷⁰ 參見徐松《登科記考》卷13，頁815—822。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⁷¹ 參見呂正惠〈元和詩人研究〉頁115—117。台北：東吳大學中研所博論，1983年。

⁷² 見李肇《國史補》卷下，台北：藝文印書館。

⁷³ 參見呂正惠〈元和詩人研究〉頁120—127。台北：東吳大學中研所博論，1983年。

⁷⁴ 參見陳克明《韓愈年譜及其詩文繫年》頁137，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

⁷⁵ 見《全唐詩》卷337，頁3774。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此詩作中，韓愈將張署、孟郊、張籍等人視為自己的隊伍成員，雖說此詩作於醉時，但文字間仍流露出韓愈以一種領導者自居的喜悅滿足之感。

畢寶魁討論韓孟詩派時，說明流派的形成，可分為自覺型與非自覺型⁷⁶，韓孟詩派的情況雖說介於二者之間，但實際上更傾向自覺型。因為，韓孟詩派的形成是由於有韓愈這樣一位當時的學術界名流、文壇盟主的大力提倡，使具有相同藝術追求的詩人集合在他的周圍，形成一個審美取向、創作風格大體相同的詩人群體，並在一段歷史期中在詩壇上產生重要轟動，對後世也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此一詩派的成員除韓愈、孟郊外，尚有崔立之、李觀、歐陽詹、張署、侯喜、張徹、皇甫湜、樊宗師、李賀、盧仝、賈島、劉叉、馬異等人，相當雄厚。⁷⁷

《唐才子傳》卷5寫韓愈，說「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聖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艷，毫髮都捐，有冠冕珮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為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啓易言也哉！」根據《唐才子傳校箋》的說法，認為此處是「辛氏評論韓愈道德文章之語」⁷⁸，如劉禹錫〈祭韓吏部文〉：「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為徒，百家抗行。當時勅者，皆出其下。……鸞鳳一鳴，蝸蟾革音。手持文炳，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直稱韓愈為「文章盟主」。⁷⁹又如李翱〈祭吏部韓侍郎文〉中所言：「孔氏去遠，陽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學者有歸，大變於文。」⁸⁰對於韓愈的「一代文宗」的肯定，不論是「頹綱復振，啓易言也哉」、「典訓為徒，百家抗行」、「學者有歸，大變於文」等，都是極肯定的評價，加上唐宋古文運動相續的觀念，無怪乎蘇軾會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⁸¹論韓愈。

⁷⁶所謂「自覺型」的文學流派，是指在某一歷史時期有某一傑出作家，不但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影響著同時代的追隨者，而且發表創作綱領和文學口號，加以引導；領袖人物與追隨者之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書札往來，唱和切磋，衣鉢相承，不但產生了一批風格相近似的作品，而且結成了文學見解相近的創作群體，儘管這些群體在活躍的當時並沒有什麼名目。而「非自覺型」文學流派，是指該流派在形成過程中並不存在自覺結合的創作群體，也不存在有某個領袖人物發表創作綱領或口號去吸引追隨者，而往往是由於歷史的、時代的以及創作主體的諸多原因，有一批作家同前輩（或同輩）某一天才作家之間，在精神上產生共鳴，心靈上達到契合，從創作題材選擇到審美取向和藝術風格上同中有異、異中見同的作品系列，這樣的系列往往有相當長的時間跨度，但從中仍可以發現作為流派的脈絡和特徵。見鍾林斌、李文祿主編中國古代文學流派研究叢書《韓孟詩派研究》頁1-2，編者前言。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年。

⁷⁷參見畢寶魁《韓孟詩派研究》頁49，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年。

⁷⁸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一）卷5，頁455。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⁷⁹見《劉禹錫集》卷10，頁327。上海：上海古籍，1999年。

⁸⁰見《李文公集》卷16，頁70。四部叢刊初編集部，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

⁸¹蘇軾〈韓文公廟碑〉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55，頁262。續修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上海：商務印書館，1995年。

「一代文宗」現象觀察

梁肅〈秘書監包府君集序〉「文章之道與政通矣」⁸²，當國家愈傾向中央集權型態，則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就愈是緊密。從文學的立場看，政治未必不是文學的「面具」或者「資源」，甚至是今天所謂的「炒作」手段。總之，不論文學家們如何「躲避」、「拒絕」甚至「反抗」，都無法自外於政治。⁸³皇室對待文學之態度，直接影響其文藝政策。而更廣泛的影響，乃在於形成一種導向，因其關涉士之升降進退，換句話說，文學在唐代是一種統治者或士族的工具。

中國的文學發展的傳統，書寫一直是受著某些觀念所制約⁸⁴，從唐代「文宗」的個案觀察，不難發現，唐代的政治權力對文學政策的介入，主要策略是透過文學規範（CANON）的建立來進行，而規範的內容包含文本或作者。首先就文本來說，這五位作者的文學創作都得到極高的社會評價，這恐怕是取得文宗地位最基本的門檻，其中陳子昂、王維以詩著名；張說、韓愈以文顯世，而權德輿則詩文俱佳，顯見唐人的觀念之中，對於「文」的概念，基本上承襲自六朝⁸⁵，並不專指「古文」或「詩歌」任何一類，也不對任何一類有偏好或褒貶。好的文學創作是必要的條件，但是否有完整有系統的文學主張，似乎就沒有那麼絕對必要。

透過這五位唐代「文宗」的觀察，我們也發現文學史的原生狀態未必如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一般，文學史上大大肯定的陳子昂與韓愈，還原至唐代的社會，其影響所及絕不如文學史略提或甚至不提的張說與權德輿。其實，任何時代任何作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審美趣味和價值標準，它們取決於由一定的社會思潮和個性特徵鑄成的文化心理結構。每個時代不同階層的人接受什麼排斥什麼，雖然也受傳統的約束，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政治倫理觀念、生活態度和心理狀態以及審美趣味等因素決定的。⁸⁶如果不能盡量還原貼近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學的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常會存在著隔靴終究搔不到癢處的悵然。

孫康宜認為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凡是被納入正典的作品無不被賦予某種政治的意義或寄託。換言之，只有當一個詩人的作品被政治化時，他才有希望被奉為典範。而一個作家的文學和歷史地位，不僅與美學標準有關，也同時會受到政

⁸² 見《全唐文》卷 518，頁 5295。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⁸³ 見童慶炳〈文學經典建構諸因素及其關係〉頁 176，收錄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2 卷第 5 期，2005 年 9 月。

⁸⁴ 朱國華認為在古典社會，文學經典的合法性建立在政治、宗教、道德的基礎上，文學作為涵養性情的文化資本，作為寓教於樂的基本手段，作為賴以證明自己文化貴族身份的文化修養的潤身工具，其美學特性並非是首要的，「辭達而已」、「詩言志」、「宗經征聖」、「文以載道」、「美是道德的象徵」、「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等觀念，一直規範著前現代社會對文學經典的理解。見〈文學「經典化」的可能性〉頁 51，收錄於《文藝理論研究》第 2 期，2006 年。

⁸⁵ 參考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頁 371—378〈「文」的觀念的辨析〉一節。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⁸⁶ 見蔣寅〈吏隱：謝朓與大曆詩人〉頁 130，收錄於《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2 月。

治因素的影響。⁸⁷這種現象又和中國的知識階層對於政教、文學，有一共同理想的「價值觀」有關。此一「價值觀」的內容為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此「理想」即是先秦儒家所開出「內聖外王」之境界。在這種「價值觀」底下，理想的「文學」是「人品」的產物，好的「人品」才能創造好的「文學產品」，讓受眾得到「提升人格」的益處。⁸⁸所以，以中國的傳統而言，成為規範的必要條件，是作品與人品都要好。觀察這五位唐代的「文宗」，此一現象非常明顯，唐代的統治者正是透過此種模式，逐漸將從漢代以來「儒林——士人」傳統與「文苑——文人」傳統分流的現象，進行整合。⁸⁹

這五位雖然都是唐代的「文宗」，但我們很容易觀察到，就影響力而言，大抵在社會上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其學問、人品、著作廣受讀者所崇仰，或繫屬於某一詩歌文學集團等，則對受眾便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或者具有較大的權威性，他的這種權威性使他的發現能推廣開來。更簡單的說，官職愈高，任職的時間愈久，相對而言，影響力就愈大，若能在加上「典貢舉」，那更是如虎添翼一般，張說與權德輿二人，毋寧說是這五人當中在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在唐代文宗的觀察中，看到了文學促進了政治的多向度發展，政治的發展也為文學的多樣性提供了空間的現象。謝思煒認為「就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而言，中國文學史可以劃分為漢以前的政教文學、魏晉南北朝的文學獨立和唐以後的文學政治化三大階段。唐代正處於後兩個階段的銜接時期，其中唐前期既總結發展前一階段的文學成就，又在新政治制度下促使文學生產條件發生轉化並為此後的文學政治化做準備」。⁹⁰觀察五位唐代「文宗」從初唐到中唐間的變化與發展，權力的介入不斷擴大，陳子昂階段文學意味較濃，政治意味較淡，但發展到韓愈階段，已是濃濃的政治意味，大大超過了文學。下一篇文章，〈唐代「文宗」之建構〉，我想已經可以提筆了。

⁸⁷ 參見孫康宜《文學的聲音》頁 110—134，台北：三民書局，2001 年。

⁸⁸ 參見侯雅文〈「稼軒詞」的傳播及其典範地位的形成〉頁 192，《思與言》第 39 卷，第 4 期，2001 年 12 月。

⁸⁹ 有關「儒林」、「文苑」在唐代的合流，可參考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 71。台北：商務印書館，1994 年。

⁹⁰ 見謝思煒〈初盛唐的政治變革與文學繁榮〉，頁 107，收錄於《唐代文學研究》第 9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